

#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理论超越与本质要义

洪光东

**〔摘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发展史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和凝练。全面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需从出场逻辑、理论超越与本质要义等维度把握“新”的意蕴,出场逻辑之“新”表现为新的历史节点凝练中国道路、新的历史阶段跳出认识误区与新的历史起点扩大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语境;理论超越之“新”表现在历史比较中对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本质要义之“新”则是科学内涵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人民至上的价值指向以及整体协调的发展方式等。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①</sup>这一表述,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概括和凝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清醒与理论自觉。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与使命,深入理解并全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的现实语境、理论的历史超越与本质要义等维度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的意蕴,对于在新阶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出场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语境

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的客观反映,根植于时代发展的土壤之中,适应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由此,要实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入理解,首先必须考量其出场逻辑,即在“大历史观”视阈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认识误区以及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挑战,多维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的现实语境。

第一,新的历史节点凝练中国道路的需要。近代以来,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

洪光东,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论述及理论创新研究”(19AKS010)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14 页。

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sup>①</sup> 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接力探索救国救亡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道路问题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基于对时代特征和特殊国情的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开启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不断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纵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追寻,不管是革命道路,还是建设与改革道路,它们都没有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和经验,而是从我国当时的现实条件出发,契合我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由我国人民来决定,彰显出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文明形式与文明发展的“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道路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不仅在于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更在于其在发展中始终遵循人类社会的价值共识,积极传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并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才使其能一直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并为人类文明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当前,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回顾百年党史就是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必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概括和凝练。

第二,新的历史阶段深化中国发展模式认识的需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带领人民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勇于拨乱反正并大胆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社会生产力从相对落后到总体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进入了持续、健康的快速发展期,造就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由此,从更深层次认识这一发展模式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新时期开辟的社会主义模式,人们在探索中就已经对其进行了概括,并形成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的概括与界定,它们的提出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以及改革中“走自己的路”的探索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论改革时就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sup>②</sup>,“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sup>③</sup>,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此后,党的相关决议虽继续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已成为国内外指称改革开放后中国探索的发展道路与制度设计的代名词。这不仅在于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就有目共睹,在国际事务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持续扩大,显现出较之于欧美发展模式的后发与比较优势。正因如此,担心失去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论及“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时,或将之简化为“经济自由和政治‘独裁’”,或将之泛化为诸如“中国问题”此类“内涵很不确定的概念”<sup>④</sup>,以消解其带来的积极影响。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⑤</sup>,“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sup>⑥</sup>,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模式”等就是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统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时代发展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④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6页。

与现实国情开辟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在新的历史阶段,有必要从更深层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其他文明形态与现代化模式的吸收和扬弃、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类文明总体进程的遵循。

第三,新的历史起点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们党在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后作出的科学定位,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彰显了党主动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与自信。但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媒介优势与话语霸权来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期干扰并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唱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掠夺论”以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等诋毁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进入新时代,尽管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舆论环境总体上还是“西强我弱”的态势。由此,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一己私利或意识形态偏见,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更加剧烈的舆论攻击战。与之前采取直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定义”“贴标签”的方式不同,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诋毁更多采取“步步为营”“渐进蚕食”的方式,如在国际交往中对我国内政的横加干涉,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的自卫行为说成是“战狼外交”;无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与对国际秩序的维护,将中国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的行为说成是“破坏国际规则”“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无视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权与生命权才是最基本的人权事实,污蔑我国推行的科学有效的防疫举措是“专制”并“限制人身自由”;无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视中国为不同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付出的努力,反而污蔑共建“一带一路”等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等。

可以说,这些论调极大地恶化了我国对外交往的环境,也给世界局势制造了新的动荡源和风险点。对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sup>①</sup>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的问题。由此,立足全球视野,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sup>②</sup>提升话语表达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社会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视角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中之重。

## 二、理论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比较

审视人类历史,文明向来是多样的、发展的,有不同的界定与划分标准。但无论何种文明形态,其形成都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并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表现出来,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冲突与融合,既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绚丽篇章,也成为文明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由此,要实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面把握,还需要着眼于其中的“新”,即在历史比较中,深入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传统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超越。

第一,对中华传统文明形态的超越。日常使用中,文明与文化有时会被当作同义词,但严格说来,文明更多指人类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历史形态,包括文化的基本构成;而文化更多意指文明的精神存在,其构成了文明的核心内容与支撑。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能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

<sup>①</sup>《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sup>②</sup>任平:《论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于世界前列,坚持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就在于中华民族在自身发展中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sup>①</sup>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构成了“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sup>②</sup>是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但辩证地看,中华传统文明与传统文化也存有不容忽视的消极面。如在社会发展观上,两千多年王朝更迭与治乱交替,使得中华民族一直推崇循环论,而不是社会进步论,《周易》中“无往不复”、《道德经》中“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都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而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更是将其与社会现实等同起来,极大地限制了民众的思维。在社会秩序观上,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建立在血缘家族基础上的严格而专制的等级制社会,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由此构建的“三纲”“五常”“天理”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与生活规范,其强调的人身依附性使得“服从”成为社会成员的主要行为方式,造成社会整体趋向保守,民众思想与行为均缺少自主性与独立性,制约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社会生产观上,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维护统治的需要,使得古代中国秉持“重农抑商”的导向,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富裕阶层习惯于土地财富投资,而非生产性投资,使得传统的农耕经济一直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因素尽管有了一定萌芽,但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大工业始终无法发展起来。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之上,是一种隶属于农耕时代并与传统社会相契合的文明形态。而这种传统文明具有的两面性,即其中的积极因素使其能最大化社会潜能,并达到农耕经济的顶峰;而其中的消极因素也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现代文明的生长,阻碍了古老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迈进。进入20世纪后,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在历经新文化的革新和洗礼后,于多种社会思潮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历经百年奋斗,最终完成了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深度调整,重塑了中国的文明形态,推动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纵观人类历史,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阶段,其破除了之前封建的等级观念,消灭了人对人的依赖性,代之以资本为自己的存在逻辑,社会也成为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sup>③</sup>。而且,“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④</sup>。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⑤</sup>。由此,无论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还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提高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等方面,资本主义文明都远超以往的文明形态,显现出其进步性与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积极面。

但历史地看,资本主义文明也存在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和缺陷,当其以资本为自己的存在逻辑时,追逐利润、实现增殖便成为其唯一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②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35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928页。

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sup>①</sup>在现实运行中,资本逻辑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它支配着一切经济活动,并将榨取剩余价值变成其唯一的追求与使命,致使社会基本矛盾加剧,经济危机日渐频繁并愈加严重。同时,资本逻辑的作用也会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②</sup>,整个社会充满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带来的乱象。具体来说,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日益堕落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盛行,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生态问题进一步凸显,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愈加频繁等。简言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的社会关系、价值追求以及整体发展等都将在金钱利益的裹挟下加剧失衡,社会日益堕落为马克思竭力批判的“虚幻的共同体”。

与之相对立,社会主义中国在发展中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坚决摒弃资本逻辑作用,并在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通过给资本设置“红绿灯”,既积极发挥由资本流动性带来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又继续强化对资本的监管和引导,限制其野蛮生长带来的弊端与风险。同时,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中,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坚持发展为了全体人民,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同时,努力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律背反”,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悖论”,在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的同时,实现了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三,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打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一统天下”局面,勾勒了人们憧憬的理想社会形态;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则更进一步,在三大超越的基础上,把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变成科学的理论,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与人类解放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实践中,“苏联模式”便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其从苏联较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出发,通过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国家可以按照计划和需要,集中调配和使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快速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正是贯彻了这些要求,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并超过大多西方发达国家。也正因如此,其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均以此为经验参考和现实借鉴,构建与之类似的制度安排,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最初形态。

客观地说,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和要求。在制度设计上,其全面舍弃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并从东方落后国家的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出发来进行制度构建,是落后国家在特定阶段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行方式,但其并非社会主义文明的唯一形态,更不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固定形态。同时,这种形态在制度安排上最主要的特征为高度集中,在体制机制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封闭僵化。可以说,前者抑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后者则制约了社会的更新,压制了社会的创造力。由此,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所具有的优越性逐渐消减,推进社会发展的内在动能逐渐减弱,整个文明形态的制度架构日渐固化,并日益显现出排斥市场的“计划崇拜”、排斥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崇拜”以及排斥民主的“集权崇拜”<sup>③</sup>等特点,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内外冲击下逐渐瓦解,致使社会变质和国家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吸收和借鉴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从不断发展的时代条件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在改革中冲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32页。

③赵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几种模式比较》,《学习时报》2012年10月29日,第3版。

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中的错误“崇拜”,实现了经济上的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政治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文化上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多样思想文化相结合等一系列理论和制度创新,扭转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利局面,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 三、本质要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阐释

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①</sup>,“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sup>②</sup>。可以说,这段论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表征以及贡献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概述,强调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形成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道路,这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选择,是多领域共同发展的新理念,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方案。当前,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还需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从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式等维度把握其核心要义,以期从本质属性上实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揭示。

第一,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底色,推进理论创新是理论要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呈现。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指导思想是灵魂,也是衡量文明形态进步性的核心标准。在此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是其进步性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创造性地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客观必然性,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便成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并构成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科学指南。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使其能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而在实践中,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结合本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先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探索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发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中凝结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要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可以说,这在促进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完成了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跃升。由此,新形态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明新形态。

---

<sup>①</sup>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14页。

<sup>②</sup>《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9页。

第二,价值指向上,群众史观是理论依托,人民至上是基本遵循,增进人民福祉是价值目标。价值指向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衡量文明形态进步与否和优劣的关键指标。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旧哲学对人的抽象探讨与对历史主体的唯心主义诠释,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将追求剩余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目的而带有典型的功利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的畸形价值观,并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得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体与历史的创造者的正确结论,形成了群众史观,从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界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为人们认识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说来,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与认识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价值主体,这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中既要发挥人民的能动性与创造力,更要践行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

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秉承群众史观,提出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奉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积极将群众史观的理论要旨转化为坚持群众观点的理论自觉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实践智慧。一方面,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立场,“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尤其要肯定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要继续依靠人民的力量创造历史”,<sup>①</sup>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秉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价值指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②</sup>而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把人民关心的问题当作工作重点,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同频共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立场,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当作根本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③</sup>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sup>④</sup>彰显了对人民逻辑的坚守。

第三,发展方式上,社会有机体是理论支撑,整体发展是基本要求,新发展理念是现实呈现。文明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整体,文明形态则是实践在社会各领域展开而“积淀形成由诸多文明要素构成的文明系统”。<sup>⑤</sup>由此,对文明形态的分析离不开对社会系统的理解。在探索中,马克思从社会的“细胞”即现实的人出发,强调物质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方式是社会“骨骼”,在此基础上“生长”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则构成社会的“血肉”,形成人们生活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形成了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在内的社会有机整体。现实发展中,不仅社会机体的各要素与各成员之间,整个社会机体也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时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流动,以实现自身正常的代谢、扩展、调节与更新。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sup>⑥</sup>可以说,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社会是由多种要素和因素相互制约、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整体;只有各要素相互作用和整体发展,才能确保其有序运转并不断进步。

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秉持对社会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性分析,以社会系统论与社会矛盾论为切入点,贯彻整体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把不断满足现实的人

①俞良早:《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观及其实践进程中的两次“推进波”》,《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24页。

④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⑤张云飞:《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家治理》2021年第25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1页。

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的同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在突出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同时,强调要统筹兼顾社会各领域发展,从改革开放初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共同发展,都是整体发展要求的生动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时代社会发展日益表现出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坚持用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来思考发展方式问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完全抛弃了把社会系统中单一要素、部分要素或特定阶段的发展绝对化、至上化倾向,实现了发展观由“要素论”与“阶段论”向“整体论”与“协同论”的攀升,有效地解决了当前发展中面临的动力不足、发展失衡、治理滞后等问题,并以全新的发展内容、属性与要求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在充实文明新形态内涵、明确新形态演进方向与条件的同时,也给文明新形态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责任编辑:陈 雪)

## The Entrance Logic,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and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ONG Guangdong

**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summary and theorization made by Xi Jinp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historical heigh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i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newnes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ntrance logic,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and essential meaning. The “newness” in the entrance logic is represented by the realities including the theorization of Chinese road at the new historical moment, the resolution to the misunderstandings at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and the increas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The “newness” of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sub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civilization in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e essence of the “newness” is reflected i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 value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the overall coordinated way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author:** HONG Guangdo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